

● 郑 达 著

艺海帆踪



广东人民出版社

郑
达

藝
海
帆
踪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特约编辑 谢成功
苏家驹
装帧设计 邓慕贞
封面题字 陈颂声

艺海帆踪 242
郑达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艺术研究所发行
韶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7.875印张 2插页 20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册

ISBN7—218—00135—1/z·7

统一书号 17111·44 定价1.80元



作者1979年在澳门

志趣和道路

——读郑达的《艺海帆踪》

杜 埃

《艺海帆踪》是郑达同志从事艺术工作多年来的自述。四十多年来作者所跋涉过的路子不算短了，这是他在漫长岁月中留下来痕迹较深的脚印，也是他所奉行的我国现实主义戏剧艺术发展的一组历史轨迹。

艺术总是从生活的母体中产生并以生活发展的倾向来反映生活，起到与时代同步的作用。尽管目前个别人的文艺观和创作方法不尽相同，甚至有的远离生活，“淡化”现实，追求“自我”，视现实主义为“过时”；如果再加上“革命的”三个字，那就更不用说是“僵化”或是不合“时宜”的了。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把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所导致下的“假、大、空”与现实主义混淆起来，就是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文艺观视为至高无上的信条。诚然，把现实主义当作“唯我独尊”和“君临一切”，当然是不好的。因为我们主张凡有益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各种创作方法均应共存，以促进文艺事业的繁荣。现实主义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本身也需要发展，要求吸收新的有益的东西，藉以提高和逐步完善本身。从我国古今的文学遗产看，现实主义是经受长时间考验的。几年来由于少数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它虽受到某些人的“冷遇”，但是，它仍然是我国文学的优良传统；革命的现实主

义(不是硬加的、游离现实而凭主观臆造的),在社会主义新时期也是理直气壮地应予提倡的,不可置疑,现实主义或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也需要有平等相待、共同协作的同盟军。“君临一切”就有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味道。然而,提倡并不等于强迫。正如参加政党一样,强迫是愚蠢的。文艺家对一种主张的提倡,更需要有充分的自愿和自由。

生活、现实是第一性的,对文艺创作活动来说也是第一性的;对一个人而言,也往往如此。《艺海帆踪》的作者原来是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学生,却选择了走向舞台的道路,这是因为当时的客观世界告诉他民族危亡的情势使之感到演革命戏比之学兽医更为迫切,更有需要,对“唤起民众,抗日救国”可起一定作用,因而他立下志趣,走上现实主义的文艺道路。这类例子不单是从文艺大师鲁迅、郭沫若等等身上可以找到,也从当时有志于变革现实的许多青年当中可以看到类似的抉择。而现实主义在我们这个曾是多灾多难,亟须变革的可歌可泣的国度,经历了几个历史时空,积聚了经验,有了不少典范之作,它已经成为五四以来文艺的一面大纛。正如“四项基本原则”一样,是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结晶,是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取得胜利的保证。革命现实主义和党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可分割的。

现实主义这面大纛也向本书作者飘扬、指引,使年轻的他在漫长的黑夜中从革命的戏剧和歌咏中找到了光明,立下了志趣,坚韧不移。虽然那“史无前例”的“文革”是从文艺、戏剧作为突破口的,作者也与许多同道者一样受到严酷的无妄之灾,但他在十年动乱后仍然锲而不舍,我和他是在一起工作的,又是共患难者,这方面的情形颇为清楚。为什么他受挫而志趣不变?那是因为走现实主义戏剧道路,是时代的需要,人民的需要,是党的事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书分为三辑:回忆录、访问记和戏剧评论。读完第一辑的

回忆录之后，我获得一个印象：从一个演剧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复杂、曲折的这一方面的历史生活，并可由此想知我国整个进步戏剧运动的概貌和党的领导以及前辈们在艰难环境下给予的扶掖和指引，从而珍惜今天的环境，加倍努力于艺术实践。第二辑是有关剧团出国的访问记。这批剧目，我把它看作是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整理或创作的民族戏剧成功地走向世界的佐证。这是主要的一点。当然不止这一点，同时还借出国访问介绍了异国的人物、风光、友谊和文化特点，对读者会引起兴趣和借鉴作用。第三辑大半是作者对一批剧目的评论，有主题探索和艺术分析。作者没有自诩为一贯正确，他并不讳言，没有把某些受了当时“左”的思潮影响的篇章纳入《艺海帆踪》之内，以免贻误读者。这一辑文章的立论，可供读者和从事戏剧工作的年轻剧作者、表、导演们以有益的参考，尤其是《每个创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这一篇。

一九八七年一月十八日

于朱村

目 录

◎回忆录◎

我怎样和戏剧结下了缘	2
战斗在国门内外	7
——杂忆演剧五队在滇缅的活动	
最后两出戏	26
——记演剧五队创作的两个小戏	
演剧队海外播种记	36
——忆中国歌舞剧艺社在南洋的巡回演出	
附录：从演剧队到职业剧团	60
驰骋千里 迎接解放	64
——创建华南文工团的一些回忆	

◎访问记◎

广东粤剧院访朝散记	81
忆咸兴	93
亲人们的相会	102
——广东粤剧团访问港澳散记	
春满香江	112
——向香港的朋友们致意	
重访香江	114
关于亚洲艺术节	117
广东粤剧团访新散记	123
妙手天然	129
——新加坡圣淘沙岛记游	

得自香港的信息	133
扶桑文化印象录	138
访美访加书简	149
为《中国周》飞向澳洲	153

◎评 论◎

重视艺术技巧 提高创作质量	159
——评全省艺术汇演中的创作剧目	
看《罗汉钱》，谈现代戏	167
日本民族艺术的花朵	172
向彩调《刘三姐》学习什么	176
喜看粤剧《刘胡兰》的新面貌	180
有胆有识 勇于创新	185
——谈《中锋在黎明时死去》的演出	
千端变幻 万种风情	189
——听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的演唱	
一封探讨粤剧遗产问题的信	193
评粤剧新作《金鸡岭》	199
一阕悲壮的战歌	202
——看广东话剧团演出话剧《红岩》	
日本农民斗争生活的画轴	205
——看日本话剧团演出《郡上农民起义》	
每个创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209
——探讨戏剧创作的一封信	
闪光的《珍珠》	213
读《广东案》有感	216
汕头观剧杂记	219

发生了，怎么办？	230
——影片《不该发生的故事》观后	
贵在一个“敢”字	233
——赞《特区人》	
从独创唱腔到塑造人物	236
——著名粤剧演员罗家宝艺术经历初探	
唯有真实，才使人信服	238
作者后记	241

(一)

回 忆 录

我怎样和戏剧结下了缘

人的岁数大了一点，回忆自然也就多了起来。回顾往事，少不了酸甜苦辣的各种回味，但真正有意义的，恐怕还是对自己经历过的事，作此一番清理，把它当做新的起步的一种动力吧。

比如象我这样本来是学农的人，怎么竟会跟戏剧结起缘来，以致于一辈子都和它分不开了呢？从我参加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敌演剧队开始，无论是在四处流动的演剧团体里，或是后来在文化行政部门，几十年来，从演戏到看戏，从写戏到谈戏，除去那“史无前例”中有七年不沾边之外，大致都没有中断过与戏剧的密切关系。

要说有七年不沾边，其实那七年也是受戏剧之累才遭了殃的。当时我曾多次暗下决心，今后再也别沾戏剧的边了。然而后来却仍落进戏剧之网而难以摆脱它，并且对于它的感情，也仍不减于过去。这种对戏剧的难舍难分的感情是不是有点怪？回顾终于使我理出了“志趣”二字。“志”者，志气也，“趣”者，兴趣也。原来我对戏剧工作的志气和兴趣，是在学校搞业余戏剧活动时就培养出来了，几十年已经过去，大概变成本性难移了吧？

我第一次登台演戏，是在一九四一年的春节。那时我正在浙江丽水的英士大学农学院读书，学校是刚开办的，我也是刚入学不久的新生。记得在春节联欢会上，师生们演出了章泯等编写的话剧《我们的故乡》，我在这出戏里扮演一个群众角色，只有几句台词，一上台就紧张得几乎透不出气来。老实说，当时我对戏剧是

丝毫没有什么兴趣的，仅有的一点认识，也就是它可以在“唤起民众，抗日救国”方面发挥一定作用，这才鼓起勇气而登上了舞台。

一九四一年秋季，我从浙江辗转来到广西，转学广西大学农学院。当时，西大的校部和各学院都设在桂林良丰，唯独农学院设在柳州沙塘。这农学院总共不到两百名学生，加上全体教职员工及其家属，大约也只千人左右。我就是本着抗日救国的这点革命信念，到沙塘不久，就与各系各年级一些同学又组成了一个西农剧社。

我们演的第一出戏，是王震之编剧的《流寇队长》。这是延安的剧本，抗战初期曾流行于全国，包括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许多剧团都曾演出过它。我们是为表示剧社坚持抗战的态度，才在首演中选演它的。但是，象我们这一班学生哥，又怎么演得好《流寇队长》这样的戏呢？可我却居然还担任主角，扮演起那位流寇队长来，这可真有如瞎子摸象，不能不闹出许多笑话。幸亏在我们之中，有一位名叫唐天培的同学，他有过业余演剧的经验，于是就由他担任导演，把参加演戏的大伙儿捏到一块，终于捏成了一台戏，而在年末正式演出于学校饭堂时，居然还受到师生们的欢迎。这位唐同学与我不同系，也不同年级；但确实是由他才引出我对搞戏的兴趣来的。既有“志”再加上有“趣”，这就对我今后之进入这一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而数十年来，当我已经叫不出那时一同演戏的许多同学的名字了，可对这位唐同学的姓名与模样，却始终不能忘怀。

紧接着演的第二出戏，是林柯编剧的《沉渊》。这是一出以反封建为主题的家庭悲剧，有点类似曹禺的《雷雨》。这出戏仍由唐同学导演。它三幕一景，角色不多，但每个角色戏份都很重。我扮演的是封建家长，是剧中主要的反面人物。大概因为这出戏所反映的生活，对我们这班学生哥较为熟悉。因而此剧于四二年春在

学院的一座新礼堂演出时，竟轰动了整个沙塘。后来在学院的一些教授和桂林良丰的一些同学的支持下，这个戏居然还去柳州、桂林作了售票公演。先后在柳州公演一场，在桂林公演三场，同时还有幸得到当时在桂林的广西艺术馆馆长、著名戏剧家欧阳予倩的接见。欧阳老为鼓励我们班业余戏剧青年，还派出广西艺术馆的好几位戏剧专家来帮我们整理和提高这出戏：有重新给我们导演排戏的，有专门指导演员作角色创造的，有帮助舞台布景加工修改的。总之，通过这一次公演，以及这些专家的指导，我对于搞戏，确已很有些“志趣”了。

于是，回到沙塘后，我这个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学生，竟把功课寄托于考试时之死记硬背，而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以搜寻在那种环境内有可能找到的剧本，予以精心研读，甚至还尝试着写了两个反映学生生活的独幕剧，作为自己的练笔。过了暑假，当新学期开始时，我们这些对戏剧的热心人，又按照去桂林时观摩过的广西艺术馆演出的《面子问题》，照葫芦画瓢，在欢迎新同学的联欢会上演出了。这是老舍编的一出讽刺喜剧，颇为辛辣的讽刺了当时的官场丑态。随后不久，到年底又排练和上演了曹禺的《原野》，并且还把一位体育老师拉进来扮演仇虎，我则反串焦大妈，扮演一个恶毒的瞎眼老太婆。与此同时，我们还以西农剧社的名义，派出唐同学作导演，协助他所在的那个系排演了于伶的《长夜行》。象这么一个学生剧社，于一年之内，居然能先后演出五个大戏，由此也可见我们的劲头之大，是大到何种程度了。

既然劲头这么大，演了一出又一出，当然也就急切地希望着自己。在桂林时，我们找了广西艺术馆的专家们作老师。在沙塘呢，就只好跑去柳州寻师，终于寻到了演剧五队。大约是四二年的秋冬之际，西农剧社好几个同学跑去柳州观看五队公演的《重庆廿四小时》，并以剧社名义去拜访五队，邀请五队把这个戏搬去沙塘公演。对于五队演出的沈浮的这出悲喜剧，我是看了一

次又一次，简直好象入了迷。经过这样多次的看戏与敦请，五队终于专程到沙塘为农学院公演了两场戏，还在每场演出时加演一些歌咏节目。后来五队的同志还观看了我们同学演的《长夜行》，同导演、演员们开了座谈会。正是在这些交往中，我和五队的一些同志取得了互相了解，以致开始建立起政治上的互相信任。我在当时身处的那种黑暗深沉的长夜里，正是从革命的戏剧与歌咏那儿才寻找到光明，正是从五队同志身上才探索到自己应走的道路的。所以从这时候起，我之投身于革命戏剧的“志趣”，算是确立下来了。

正由于这种因素的存在，故而一阵风浪打来，就把我这个正沉浮于险礁恶水中的人，抛上了革命戏剧这条航船。在四二年冬，有一天午休，我正在宿舍里阅读一本从图书馆借来的有关苏联十月革命的书，学院的一个外号叫“皮帽子”的生活训育员跑来找我的岔子。他冲着那本书，追问我是从哪里搞来的，为什么要读这类书籍？我回答来自学院图书馆，馆内既有这类藏书，我当然就有借阅的权利。两个人争吵一番后，学院院长找我去谈话了。他明白地警告我，不准赤化，为了养性修心，尊师敬业，故此勒令我退出西农剧社，禁止我再上台演戏。所以后来剧社排演《人约黄昏》和《月亮上升》两个独幕剧时，我就被迫不能参加了。这阵风浪虽然还不算大，但却促使我想要离开学校，干脆去参加演剧五队。我把这种想法告诉了几位要好的同学，他们都劝我慎重考虑此事。唐天培就劝我，不如再熬它一年，将文凭熬到手再说，我也正为此而犹豫不决。谁料风浪尚未停止，就在那年将临暑假的一天，院长又把我找去谈话了。他说：“学院的三青团准备办一个剧社，你喜欢演戏，可以让你来组织它。”我吃惊地回答：“我可不是三青团员呀！”他说：“那不要紧，我介绍你参加嘛！”原来他就是这个学院的三青团干事长。这样，我就只得以“考虑”之词来求脱身之计了。我先同演剧五队联系好，一放暑假，就以

去湖南衡阳探亲为名，卷起铺盖，先往衡阳的姐夫那里转了一趟，然后钻进五队住地——柳州郊区的大龙潭，从此永别了我的学生生活。我躲在比较偏僻的大龙潭直到五队离开柳州去云南，大约有好几个月，学校里竟没有人知道我去哪里。

从上述经历可以看到，我之所以从学农而改行搞戏，其源盖出于“志趣”。这就是说，因为有了对“抗日救国”的革命要求而产生的“志气”，又有了戏剧可以“唤起民众”之初步认识而产生的“兴趣”，这才造成我与戏剧结下这难解之缘。

此缘既结，业已数十年，今后谅必也是至死方休的了。旧时“抗日救国”，今日“建设四化”，这都是为了振兴中华，都要用戏剧来“唤起民众”的。我决意终此生而保持这“志趣”，并愿以此与同行们共勉。正是：

岁临花甲忆从前
戏剧生涯四十年
万里征程犹跃马
且将秃笔作长鞭

一九八二·四·廿六·

（原载《南国戏剧》1982年8月号）

战斗在国门内外

——杂忆演剧五队在滇缅的活动

全国第四次文代会期间，从各地来京参加会议的以及在北京工作的，原抗敌演剧队、抗敌宣传队、孩子剧团和新中国剧社的同志，共百数十人，在西苑旅社餐厅的一角举行了一次聚会。许多老战友都是多年未曾见过面的，有的虽曾照过面也是匆忙交臂，哪有这种闲心安坐，畅叙旧情的机会。席上，一些同志在大伙儿的邀请下唱起了过去演唱的歌曲，舒模同志更指挥全体齐唱了《军民合作》和《你这个坏东西》。这是舒模同志当年创作的由各演剧队唱遍了抗日前线与后方的两首群众歌曲。大伙儿放开喉咙高声唱，一唱就把这群头发已经花白的当年的演剧队员们的青春朝气，又给唱出来了。歌声引出了许多难忘的回忆。聚会主持者吴荻舟同志站到椅子上，号召大家要拿起笔来，把过去的战斗经历写进我国现代革命的演剧史册。歌声也重新勾起了我要为五队在滇缅一带活动的情况写一篇回忆录的愿望，而这一愿望是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就产生的。这不仅因为演剧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走出国门到国外战场去演出，乃是绝无仅有之事；而且也因为这件事竟然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加重“别动队”罪名的一条“罪证”。三年来，这一愿望未能实现，忙忙碌碌固然是一个原因，主要的还由于事隔三十多年，有许多情节都已模糊甚至忘却了。今天来酬愿，也只能是拉拉杂杂的作如下一些回忆而已。